



青 年 信 箱



道德·情操·风尚

D

AODE QINGCAO FENGSHANG

道德 · 情操 · 风尚

——青年信箱(二)

上海人民出版社

封面装帧 沈蓉男

道德·情操·风尚

——青年信箱(二)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4.375 字数 68,000

1979年10月第1版 197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00

书号 3074·527 定价 0.29元

编 者 的 话

我们在工作中，经常和青年同志接触。他们给予我们很大信赖，在交谈和通讯中，把自己及周围青年在思想、学习、工作、生活等方面所遇到的问题，坦率地向我们倾吐，要求我们与之共同商讨，帮助他们排忧解难。

我们感到这些青年同志是要求上进的，他们的愿望应该得到支持。为了开辟一块谈心园地，和广大青年共同探讨一些大家关心的问题，我们选择一些青年来信，请有关同志回复作答，不定期地陆续地编辑出版《青年信箱》。

《青年信箱》第一辑《理想·学习·爱情》出版以后，受到了青年的热烈欢迎，不少青年写信给编辑部，称它为青年的知心朋友，为青年提供了重要的精神粮食。有的青年流着眼泪读完革命妈妈张琼同志的复信后，激动地写信向她表示：“我们这一代人决不辜负妈妈的期望，一定为实现‘四化’加倍努力工作和学习，夺回被林彪、‘四人帮’耽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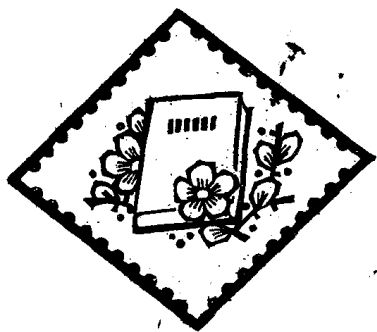
的青春，用双手在洒满烈士鲜血的土地上建设起‘四化’的宏伟大厦！”不少同志还进一步提出了有关道德品质、情操、风尚方面的许多问题，我们选择了一部分，请有关同志和我们一起探讨，编就了《青年信箱》第二辑《道德·情操·风尚》。

我们热诚希望广大青年及关心青年成长的同志，给予大力支持，对《青年信箱》提出意见和建议，并踊跃来信，把青年在思想、学习、工作、生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具体坦率地告诉我们，以共同耕耘这块园地，使它如春花勃发，充满生机，成为青年的良师益友！

一九七九年六月

目 录

不要礼教 但要礼貌	晓 江(1)
我不愿做“笼中鸟”	石俊升(9)
忠贞可贵 负情可耻!	许 寅(17)
这是反封建孝道吗?	包连宗 王传贵(28)
赌博经害人精	林 鉴(35)
对脏话来个“大扫除”	家 谦(41)
好朋友在走下坡路,怎么办?	曹宪镛(46)
讲情义有什么错?	林 帆(51)
保尔幸福吗?	吴运铎(57)
“向前看”不要“向钱看”	周原冰(64)
美,有标准吗?	孙 逊(72)
师傅为什么和我过不去?	向 伶(81)
怎样把妹妹拉回来?	苏 炜(88)
电视机前的一场争论	肖 伶(96)
“鱼目混珠”引起的苦闷	成 谷(104)
“关系学”是不是一门必修课?	萧 丁(113)
中学生能不能谈“敲定”?	王胜荣(120)
我徘徊在十字路口	李 涛(126)



不要礼教 但要礼貌

编辑同志：

我是一个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为人爽直，无拘无束，素来不讲虚伪客套。对那种开口谢谢闭口请，衣冠楚楚，彬彬有礼等资产阶级作风，很看不惯。可是偏偏碰到一个喜欢讲“礼貌”、“文明”的顶头上司，搞得很不愉快。为了说明问题，不妨举几个例子你听听：有时候办公室门关着，我没敲门，脚一踢进去了，说我粗鲁；对老师傅我有时叫叫名字或拍拍肩膀，则说我老三老四，不尊重人；甚至连衣服不扣好，帽子有点歪等生活小事，也被说成是衣冠不整，不讲文明……我们小组另一个青年，礼貌可说学到了家，人家帮他一点忙，他必讲谢谢，碰撞了人家一下也要连称对不起，整天张师傅

长,李师傅短,嘴巴甜来西,对这种虚伪客套的资产阶级作风,我十分讨厌,而那位顶头上司却认为他是我的标兵。编辑同志,你看看,我这位上司身为无产阶级的干部,却在大力提倡早就批判过的封建礼教和资产阶级的所谓文明,这对吗?我实在想不通,写封信和你谈谈心,请你评评理。

林 洪

一九七九年五月六日

林洪同志:

你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们革命青年要不要讲礼貌、文明?为了这个问题,你和领导产生了矛盾,很不愉快,并要我来评评理。你既信得过我,我也是个爽直人,就不客气地谈点看法供你参考。说老实话,我是赞成你那位顶头上司的意见的,而对你的“不以为然”的态度是并不赞成的。我觉得,你对礼貌、文明等问题存在着糊涂思想,有些界限没有划清。表现在哪里呢?

第一,你混淆了礼貌与礼教的概念和内容。这两者虽然都有一个“礼”字,但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礼教,是古代统治阶级为巩固其等级制度和宗法关系而制定的社会规范和道德标准,诸如“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的“三纲五常”,“未嫁从父,既嫁从夫,

夫死从子”和“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的“三从四德”，都是束缚人的绳索，戕害人的刀子。鲁迅小说《祝福》，通过祥林嫂一生的悲惨遭遇，深刻地揭示了“礼教吃人”的罪恶。因此，封建统治阶级等越是叫嚣“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人民越是要越礼而视，越礼而听，越礼而言，越礼而动，斩断礼教的绳索，推翻礼教的殿堂。否则，社会就不能进步，人民就不能翻身。然而，打倒吃人的封建礼教，决不是不要礼貌。礼貌，体现着对他人的关怀和尊重，是保持人们正常关系的重要准则。不讲礼貌，就要伤害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如果连最起码的礼貌都没有，社会生活的车轮就不能正常转动。因此，和封建礼教相对立，我国人民从来就有讲礼貌的传统美德。“虚席以待”、“倒屣相迎”以及“程门立雪”、“三顾茅庐”等等以礼相待的成语和典故，在历史上广泛流传，就深刻地反映了这一点。人们尊重别人，也要求别人尊重自己。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讲过这样一件事。一九三七年，当他新到陕北苏区时，由两个孩子侍候他吃饭。他对其中一个孩子说：“喂，拿点冷水来。”孩子毫不理睬他。他又招呼另一个孩子，结果也是一样。这时，交通处长李克农同志扯扯他的衣袖，对他说：“你可以叫他‘小鬼’，或者可以叫他同志，你不能叫‘喂’，这里什么人都是同志。”斯

诺立即改用“同志”称呼，以礼相待，两个孩子也投桃报李，热情相迎，关系很快地融洽起来。这事给斯诺以很大教育。他写道：“这些孩子真是了不起。在中国儿童间，我从来没有看到这样伟大的自我尊严。”这种人的尊严，也正是要求以礼相待的基础。这点，在今天社会主义时代，更有可能和必要大大加以发扬。从可能性来说，社会主义社会不同于以前的一切剥削阶级社会，它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共产主义集体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人们从利己主义的冰水中解脱出来，相互间就可能建立起真正的同志关系，从而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真正的礼貌。从必要性来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集体的事业，需要依靠亿万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有力量。互不关心，冷眼相向，无助于团结的加强；互不尊重，瞪眼相对，更有损于安定团结局面的形成和发展。相互尊重和关怀，是同志、朋友间加强团结的胶合剂，也是整个国家加强安定团结的胶合剂。因此，我们不要礼教，但要礼貌。

第二，你割裂了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你认为人们相互尊重、讲礼貌是虚伪客套，不正确地把礼貌和虚伪客套等同起来。其根源就在于割裂了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古话说：“诚于中而形于外。”内

容从来是要求有与自己相适应的形式的。内心真尊重和关怀别人的人，必然表现为讲礼貌；相反，那些不讲礼貌的人，内心却往往是不尊重，不关怀别人的。只要稍为注意一下生活，就会发现这样大量的事例。那些对长辈出言不逊，对朋友态度粗暴，行为野蛮无理，处处盛气凌人，横冲直撞，在公共车站上拚命乱挤乱轧，在影剧院里随意走动，尖声怪叫，不讲礼貌的人，大多是目中无人的自私自利者。相反，那些和蔼可亲地向别人问好，随时注意和照顾别人的困难，在公共场所扶老携幼，讲礼貌的人，大多是以他人为重，真诚待人的。这表明，行动上有“礼”还是无“礼”，正是一个人的高尚情操的表现。讲礼貌，不是虚伪的客套，而是内在的优秀品质的外化。要求青年讲礼貌，归根结底也正是要求青年在思想上锤炼以他人为重的集体主义精神。当然，虚伪客套的现象也是有的。象《满园春色》中的那位二号服务员，他对顾客似乎热情得很，满嘴“同志们好！”面孔也是笑嘻嘻的；然而，他从不为顾客解决一点实际问题。这是“有口无心”的做作，不是我们所讲的礼貌。我们要求的，是口与心的一致。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说过：外表的文明要同内心的文明一致，外表的整洁和文雅应当是内心纯洁和美丽的表现。这就是我们所提倡的礼貌文明。

第三，你对文明的理解是片面的。你说，那种开口谢谢闭口请，衣冠楚楚，彬彬有礼，是资产阶级作风。这种把文明一古脑儿看成是资产阶级所特有的观点，是对资产阶级的过誉，对无产阶级的歪曲。什么叫文明？清朝李渔的《闲情偶寄》中说：“碎草昧而致文明。”文明是相对野蛮来说的，它是社会进步的标志。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的文明程度总是越来越高。从历史进化观点来看，虽然资产阶级比封建主、奴隶主要文明些，但与无产阶级比较起来，则是“小巫见大巫”了。拿礼貌来说，前面讲过，它的实质是对别人的关怀和尊重。而资产阶级由于本质上是自私自利，尔虞我诈的，他们往往台上握手，台下踢脚，脸上笑咪咪，心里恨滋滋，因而他们的一套礼貌，往往成为一套虚伪与委婉的应付手段。一九三一年，鲁迅写过一首题为《南京民谣》的诗：“大家去谒灵，强盗装正经。静默十分钟，各自想拳经。”就是讽刺蒋介石、汪精卫之流的表里不一的。你看，他们对中山先生灵柩的礼拜是多么虔诚呵！一般静默三分钟，他们却要静默十分钟，以表示他们都是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互相支持，互相提携，可是内心呢，却是各怀鬼胎，准备一套击倒对手的“拳经”。可见，真正能够关怀和尊重别人，具有礼貌文明的，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当然，文明，除了它

的思想内涵以外，还包含有文化素养的意义在内。礼貌文明，表现在待人接物上，就要有文化修养，就不能有开口骂娘，闭口骂爹的粗野相。资产阶级一般拥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对此，我们不能倒脏水，连小孩子也一同倒掉；不能因为要否定资产阶级，就把文化性也否定掉。文化，归根到底也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加里宁说过：文化性是证明一个人长进程度的确切标志。因而他把它列入共产主义教育的基本内容之一。不讲礼貌，正是缺乏文化的表现。至于“衣冠楚楚”，如果是专门讲究衣饰豪华，“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那当然不足取；但是，如果是指衣冠整洁，则也正是文明表现之一。因为衣冠不整，以至随地吐痰，乱抛果皮纸屑等等不讲卫生的现象，也是缺乏文化的表现，都是与共产主义教育相违的。针对有人与臭虫“和平共处”的现象，加里宁尖锐地指出：这是一种极可耻的现象。他说，对这样不文明的人，根本无法议论共产主义社会里的人究竟应当是怎样的。毛泽东同志早在三十五年前就明确指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他号召我们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由此可见，无产阶级不是不讲文明的，而是要大讲特讲文明的。讲礼貌文明，也就是要提高我们的思想境界和文化素养。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提倡待人接物以“礼”相待，在思想原则上不是无“理”而是有“理”的，对革命事业不是无“利”而是有“利”的。革命青年不应该摒弃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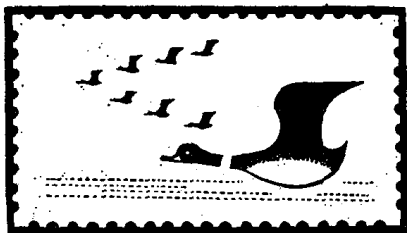
最后，我衷心希望你能接受领导的意见，成为一个讲礼貌，爱文明的现代青年。

祝您

愉快！

晓 江

一九七九年五月十六日



我不愿做“笼中鸟”

编辑同志：你好！

我坦率地告诉你，我在工厂当车工，在人家眼里，是个“后进”青年。要问“后进”在哪里嘛，主要是我不习惯那些束缚我自由的“纪律”。比如什么迟到呀，早退呀，我不大在乎；对小组搞生产竞赛，我觉得太吃力，不大认真；在食堂里排队买饭菜时插插队，抢抢先，等等。我总在想，人生在世就图个自由自在，不自由，不就象笼子里的鸟啦？这样生活还有什么意思？我记得外国有位诗人曾写过这样一首诗，说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我觉得这话说得好。可我周围有些人对这一点却不理解，反而指责我是闹无政府主义，这么一说，我就不该有自由了？同志，

你说说看，这个问题究竟该怎么看？

此致

敬礼！

李 怀 银

一九七九年六月六日

怀银同志：你好！

来信收到。你在生活中能提出一些自己感到迷惑不解的问题，并且很想弄清楚它，这说明你是有进步愿望的。我虽水平有限，却很乐意就怎样看待纪律与自由的问题，和你共同商讨一番。

不知你到自然博物馆去参观过没有？那里有一幅我们的祖先集体狩猎的图画，曾经吸引了我，一大群猿人手持石块、树枝，呼啸而上，追逐野兽，虽无严整的队形，却也显示出集体的力量，领头的回首振臂，似在呼唤后边的人跟上，似在指出攻击方向。伫立画前，我在想，即使在人类的童年时代，为了生存，也不能自由化，当时虽无成文的捕猎时候的纪律条文，但在实践中，大家都深深懂得非得要统一步调，协同作战不可。不这样做的话，必然轻则惊走猎物、错过战机，重则为野兽所伤害。看来为了集体的利益，遵守必要的纪律，实在是非常重要的。

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是想要说明，如果说远

在还没有出现今天意义上的人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尚且不能毫无约束地生活，更何况在社会主义时代，在我们团结一心奔向“四化”的今天。

无产阶级为了保证各项工作取得胜利，必须坚持在各个方面要有组织性、纪律性。这些革命的纪律，反映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绝大多数群众的愿望，它和一切剥削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残酷镇压人民的所谓纪律有着根本的区别。让我们略略回顾一下历史吧。在中国的奴隶社会里，统治者把人分成十等，从天子到庶民，在衣、食、住、行上，都有不可逾越的等级差异，不可违背的严酷的纪律；在封建社会里更是等级森严，尊卑有序，仅仅统治阶级内部就划分为二十个等第，谁不守这个纪律就要掉脑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表面看似“自由、平等”，实际上是以财产的多少来划分等级的，“金钱纪律”支配着社会生活。历史向我们雄辩地证明了，只有无产阶级的纪律才是造福于人民，有益于群众的。因此，我们每一个真正的革命者，都应该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并自觉遵守革命纪律，积极维护革命纪律，而不能对它有丝毫的损害，损害这个纪律就是损害革命。

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个人自由与遵守必要的纪律是一致的。如果没有一定的秩序，一定的纪律，个人的自由也得不到保障。你如若不